

迪·努·艾地

勇敢,勇敢,再勇敢!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七届一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



人 民 出 版 社

迪·努·艾地

勇敢,勇敢,再勇敢!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七届一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D. N. Aidit
BERANI, BERANI! SEKALI
LAGI BERANI!

根据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印度
尼西亚《人民日报》译出

迪·努·艾地
勇敢,勇敢,再勇敢!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frac{1}{8}$ · 字数 45,000

1963年3月第1版

196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725 定价 (45) 0.20 元

目 录

一、政权必須同要建立的經濟結構相适应	3
(一)关于巩固已經取得的胜利的任务	4
(二)关于克服經濟困难的任务	8
(甲)关于国家財政	8
(乙)关于生产	11
(丙)关于对外貿易	18
(丁)关于人民的生活費用	20
(三)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任务	23
二、加强国际反帝統一战綫,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36
三、改进领导方法,并有計劃地开展工作,繼續前进	50

亲爱的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會議是在一九六二年四月我党第七次（特別）全国代表大会后的十个月举行的。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闡明了在当时需要闡明的在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所有問題。由于我們对所有这些問題的看法一致，在这十个月以来，而且在今后，我們党能够大踏步地前进。正如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要求的那样，我們党在高举**民主、团結和动員**三面民族的旗帜方面，在繼續进行党的建設以及完成所有国内和国际的任务方面，都真正作到了一个思想，一条心，一个目标。

面临着因西伊里安問題而可能和荷兰殖民主义者发生战争、为了恢复治安而动員群众以及在防止因官僚資本家的腐蝕作用而引起經濟方面的总崩潰的日益高漲的人民斗争中，共产党人队伍和人民的思想一致已經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高举民族的三面旗帜的同时，我們在**一手拿枪，一手拿鋤**的統一意志下正在并将繼續不断地开展斗争。这就是說我們一面随时准备打击革命的敌人，一面准备发展生产。

由于正确的路綫和統一的意志，印度尼西亚人民在沒有同荷兰殖民主义者进行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胜利地执行了人民的三項命令。荷兰殖民主义者在还没有进入战場前，就被迫退却了。与此同时，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分子基本上已經肃清。这一切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人民已成功地爭取到一定程度的民主，成功地加强了以“納沙貢”^①为核心的民族統一战綫，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

動員了我們民族內部一切革命的潛力，特別是在人民的全力協助下動員了武裝部隊中的愛國力量，同時也贏得了社會主義國家和世界上其他新興力量的援助和支持。

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阻止已經起來了的群眾。他們不僅將完成解放西伊里安的鬥爭和恢復治安，而且將掃清一切阻擋人民革命運動的障礙，——如緊急狀態（戰時戒嚴法令），官僚資本家、買辦和地主，總之，所有反對《政治宣言》和反對以“納沙貢”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的那些人——而繼續前進。

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三項實際任務是：第一，鞏固已經取得的勝利；第二，克服經濟困難；第三，反對新殖民主義。

只有我們繼續堅決高舉民族的三面旗幟，在執行這些任務時把黨的建設任務和國際任務結合起來，這三項國內任務才能很好地貫徹執行。

當我們對國內任務、黨的建設任務和國際任務都明確了之後，緊跟着我們還必須**敢想、敢說和敢做**。

我們已經把一九六三年規定為“勇敢年”。這和蘇加諾總統向印度尼西亞人民提出的以敢于冒險的精神過生活的號召是相符的。把今年稱為“勇敢年”，這是極其符合人民的願望的，他們希望千百萬人民群眾隊伍的先鋒隊能更勇敢地領導他們。也正因为如此，我們才把這個政治報告題為“**勇敢，勇敢，再勇敢！**”。

同志們，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和這次中央全會之間的時期內，我們失去了我們親愛的**蘇哈迪**和**沙爾米迪·烏達爾約**兩位同志。讓我們大家起立，靜默志哀，向他們為了人民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偉業而作出的所有貢獻表示我們的敬意和感謝。

① “納沙貢”是印度尼西亞文“民族主義者、宗教界、共產主義者”的縮寫。——譯者注

一、政权必須同要建立的經濟結構相适应

同志們！

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爭取民主和爭取成立互助合作內閣”的口号鼓舞下，在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总报告中提到，“目前我們对内政策的十分重要的問題是高举民族的三面旗帜，即民主、**团結和动員**，以走向在政治制度和在人民的政治自由方面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具体地說就是走向：**成立‘互助合作內閣’，撤銷緊急状态，以及重新考虑現行的緊急状态法令。**”到目前为止这个結論仍然有效，因为在最近十个月內我們所取得的成就还没有超出这个政治任务。

工作內閣成立以来，包括調整以后的時間在內，到現在已三年半了。这个內閣的政綱称为三項政綱，即：（一）向人民提供足够的衣食；（二）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三）繼續进行从經濟上和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西伊里安）。

政綱的第一項完全沒有实现；政綱的第二項已經部分实现，这是由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約章”集团和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等反革命叛乱分子已經被击败了，但这并不是說，人民和国家已經得到安全；政綱的第三項也已經部分实现，这表现在根据正式協議西伊里安即将移交給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但这并不是說，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特别是在經濟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經結束。

苏加諾總統把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的讲话題为“胜利年”是正确的，因为西伊里安問題的解决和反革命叛乱集团的被肃清，的

确是巨大的胜利，但这并不是說政綱的第二和第三項已經實現了。因此苏加諾总统还強調說，已經取得的只不过是胜利的**开端**。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須深刻地認識到，我們所取得的胜利只是初步的胜利，或者更确切地說，这样的胜利还不保險，还不穩固。尤其是我們想到向人民供应足够的衣食并沒有实现，人民的衣食甚至越来越困难，而且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無論在西伊里安或者在我們共和国的其他地区，仍然在自由活动。

由于这些原因，我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在迎接“**胜利年**”时，肩負着三項最緊迫、最实际的任务，即第一，**巩固已經取得的胜利**；第二，**克服經濟困难**；第三，**反对新殖民主义**。

我們执行上述三項任务，是同执行归納为党的三面旗帜的党的总路綫分不开的，是同在执行党的总路綫过程中出現的重要的和有决定性的任务，即归納为民族的三面旗帜的任务分不开的。为此我們提出了“**高举两組三面旗帜执行三項任务**”的口号。

三項任务是目前局势发展所产生的所有实际任务的概括。为了推动我国的政治发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須認真地完成这三項任务，因此我們需要比較詳細地談一談这方面的問題。

(一)关于巩固已經取得的胜利的任务

为了巩固我們已取得的大胜利，我們必須毫不懈怠地加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西伊里安的力量，以便尽快地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版图，以便使它不致于变成新殖民主义的控制地区，不致于被帝国主义者变为自由进行投資的場所，結果使帝国主义一旦认为有必要时就能借口“保护他們在該地区的財產”而派遣軍隊到那里去。那就將意味着西伊里安將再次变为一支对准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手枪，但这时就已經不是腐朽了的荷兰殖

民主主义者的手枪，而是侵略性和掠夺性最强而又最蛮横的美帝国主义者的手枪了。

令人十分高兴的是，西伊里安的印度尼西亚儿女在解放西伊里安斗争的现阶段中，积极地起来要求尽快地使西伊里安回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管辖下。这也是在反对西伊里安的新殖民主义斗争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在巩固治安的成就方面，进步人士，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须把治安问题当作是自己的问题，因此必须和负责治安的有关方面进行良好的合作。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加诺总统在泗水纪念“人民的三项命令”发布一周年的大会上，宣布取消紧急状态。取消紧急状态并不是说让我们在安全方面减弱我们的警惕性，使反革命分子有机会进行活动。相反地，取消紧急状态必须进一步提高我们对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同时必须给人民以自由，使人民无论在提高生产方面或者在打击反革命方面能够发扬战斗精神，卷起袖子行动起来。

为了剥夺人民在取消紧急状态以后将获得的民主，官僚资本家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正在竭力准备采取一系列的步骤。过去，他们早就企图通过保持地方上的“政、军、警、法四位一体”的独裁统治，把他们的爪牙派到乡村去实行控制，为了夺取已有的民政机关的职权而建立他们自己的机关等等严重地破坏民政机关所建立的秩序的办法，以便实现没有战时戒严法令的战时戒严状态。右翼社会党人为了实现没有战时戒严法令的战时戒严状态，尽力散布他们的反动的建议。这是和首席部长哈吉朱安达工学士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梭罗举行的全印度尼西亚省长会议的致词中所发表的声明相违背的。他在这个声明中明确指出：“从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起，将正式取消最高战时掌权者和地方战时掌权者，同

日，中央和各地方的权力将全部交还给民政机构……地方长官在他的地区内行使政权和维持治安的权力。这就是说，为了维持本地区的公共秩序和安全，在现行法权范围内，地方长官有权制定政策和基本路线，官方或非官方对此都必须遵守和重视。”

一切民主和爱国力量不能犹豫和后退，相反地必须敢于阻止旨在实现没有战时戒严法令的战时戒严状态的企图。总之，当战时戒严状态取消之后，我们必须认真地和全面地实现苏加诺总统所说的“《政治宣言》指导枪杆子”。

为了使紧急状态的取消真正地给革命活动带来自由，同时使人民的创造力得到解放，而不是给反革命分子以方便，我们党认为成立有“纳沙贡”参加（不是作为核心）的协助革命领导协商机构是有积极的一面的，这个机构可以协助苏加诺总统在没有战时戒严状态的情况下行使最高职权以完成现阶段的革命。

我们必须巩固的另一个巨大胜利是民族阵线。尽管它经常遭到国家机关本身的“留难”和“束缚”，我们仅仅在两年的时间内就成功地建立了民族阵线，其成员包括一切凡是接受《政治宣言》的政党、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这是在加诺兄领导下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的一个伟大胜利。这再一次证明：只要哪里有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那里就不出乱子。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进行反对冒牌的《政治宣言》支持者的斗争。

当反动分子破坏民族阵线不能得逞之后，他们继续在散布解散一切政党而把民族阵线变成独一无二的党这样的思想，以便捣乱。他们不仅要危害政党的生存，而更主要的是想破坏民族阵线本身，因为他们知道，民族阵线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存在着各政党和群众团体之间的良好合作。

维护民族阵线是同维护政党制度分不开的。我们在民族阵线

中團結起来，就是为了在执行共同綱領，即《政治宣言》时團結起来，并不是要把不能溶化在一起的东西溶成一体。

关于这一点加諾兄曾經很正确地說過：“我們不是要民族主义者改变他們的思想信仰变成伊斯兰教徒或者变成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要馬克思主义者或者伊斯兰教徒变成民族主义者，我們所希望的是这三派能够和睦相处和團結起来。”（《在革命的旗帜下》，第5頁）

加諾兄在他的《实现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这篇文章中写道，必須要有一个真正的先鋒党，他还进一步解釋說：“还可以有其他政党……不当指揮官，……而只当僚佐……”由此可見，加諾兄的思想是和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及其在印度尼西亚的追随者的思想完全沒有相似之处，完全不是要建立一个反动的資產階級政党而鎮压工人階級。如果我們還記得加諾兄在《在革命的旗帜下》第256頁曾写道：“我們的軍隊是真正的平民的軍隊，……一个从农民取得很多人力的軍隊，但是工人的队伍，无產階級是我們的先鋒队”，那末，这一点就更清楚了。

因此，有一个以上，一个以上政党存在并不是什么禁忌。实际上現在我們国家有十个政党，至于哪一个党当先鋒，要由人民来决定。只有为維護人民的利益和为人民的斗争的忠心耿耿的党，才能取得这种先鋒的地位，而不是根据主观願望，也不是根据什么法律或条例所能决定的。共产党人深刻地認識到，在人民斗争中不付出什么代价是不能取得这种先鋒地位的，仅仅根据工人階級及其政党必然起领导作用的历史发展規律也是不能取得这种先鋒地位的。只有在維護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表現出自己的无限忠誠、不怕牺牲和勇敢无畏的政党才能取得这个地位。

在反动派分裂民族團結的活动中，最近期間出現了一种新馬

斯友美主义，那就是他們想把神道的原則从“建国五原則”分割出来，并利用这个原則到处进行威胁，并煽起宗教狂热。他們完全抹煞“建国五原則”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一个原則或互助合作原則，它包含着社会中的一切力量和各种思潮之間实行**革命的忍让**的意思。

民族陣綫已經而且将要起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将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样，在实现三項任务、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克服經濟困难和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民族陣綫也能够起很大的和积极的作用。

(二)关于克服經濟困难的任务

在談到第二个任务——克服經濟困难——的时候，首先需要先談一下有关国家經濟情况的几个方面。我們扼要地分析一下以下几个方面：**(甲)关于国家財政；(乙)关于生产；(丙)关于对外贸易；(丁)关于人民的生活費用。**

(甲)关于国家財政

临时人民协商會議确定，金融稳定是建設中很重要的因素。在各个有計劃的建設阶段中提高各部門的生产是主要的目的。国内必需品的流通問題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取决于生产的发展。金融的稳定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反过来，財政不稳定又会破坏生产。这就是說財政政策必須为生产服务，而不能执行其目的不在促进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反而牺牲生产或者使生产更加恶化的錯誤的財政政策。事实证明，总统的財政方面的助手沒有成功地执行这样的財政政策，也沒有执行临时人民协商會議所作出的稳定金融的决定。

苏加諾總統曾提到，为了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在执行人民的三项命令和消灭“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集团和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等反革命分子，需要有足够的经费，这是正确的。这一项政治任务必然要影响到财经方面。但是，经营管理不善使经济和财政恶化，这也是事实。在执行人民的三项命令的时候，不应当，也不容许发生这种情况。那些经营管理不善的人错误地利用人民的三项命令为自己谋求利益。因此，在坚决贯彻苏加諾總統在泗水作的关于“胜利年”的报告和关于人民的三项命令一周年的报告时，消灭财政经济方面经营管理不善的现象，这是十分重要的。

显然，目前在国家财政管理上不能保证效率，所以在使用上未能防止浪费现象。这些结果都可以从社会中看到。关于国家财富使用不当的消息，现在越来越多，而没有传开的一定会更多。财政方面的管理不善，除了浪费以外，主要的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上级有关机关的监督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更不可能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即群众的监督，也就是政府官员所宣扬的所谓“社会监督”。仅仅以为实现民主管理而成立的企业委员会或諮詢委员会等机构这一工作来说，用苏加諾總統的说法，就进行得像蜗牛爬行一样。

(二)由于国家财政管理组织中的有效因素——配合工作没有实现，因此不能体现建设部门在国家财政分配中的优先地位。虽然有了优先发展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经费的分配中却没有体现原订的先后顺序的规定。其后果是次要部门挤掉了应该给予优先照顾的部门。

(三)国家财政收支预算，无论在经常费用支出和建设费用支出方面，都还没有贯彻执行《政治宣言》。这就是说国家财政收支

預算沒有体现根据《政治宣言》而制訂的財經方案。《政治宣言》及其执行方針規定了国营經濟必須居于領導地位，但是目前的国家財政收支預算還沒有改变过去依賴直接稅和間接稅作为国家收入的性质。国家的收入不是依靠現有的国营企业或其他生产部門的收入。在解决国家收入的困难方面，仅仅采取了金融方面的技术性措施和停留在增加直接稅和間接稅的办法上，这是从社会上取得更多錢財的最簡易的办法，但却是加重人民的負擔、遏制国家經濟发展的办法。而对那些从通貨膨脹中撈取了大量利潤的人却一点也沒有触及。稅收政策不是根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則，相反地，通常是取之于人民而流进了官僚資本家和新暴发戶的口袋。

(四)應該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的**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和国营貿易公司）**還沒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地，由于这些企业把貸款大量地用在非生产性的支出上，以及經常的鋪張浪費，而仍然成为国家財政的負擔。所有这一切，根本原因在于严重的經營管理不善。

印度尼西亚盾的价值一年年地急剧下降。购买食物时，盾值只有原来的百分之二十四或者是下降了百分之七十六。以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底雅加达的食品物价指数和一九六二年一月初比較，已經增加了三点二倍，而同期工資平均只增加百分之三十，相形之下，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大大降低了。

根据上述金融的現實情况，有必要在財政方面采取如下各項根本的和技术性的經濟措施：

(一)国家收入必須依靠生产、運輸和国内外貿易部門的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和国营貿易公司）的加强經營管理。通过在經營管理方面对人事和机构的整頓和整肅，提高生产能力或提高生产水平，以期增加国家的收入，而不是通过提高价格和稅率的办法来

增加国家的收入。

(二)直接稅和間接稅收入的增加,不應該通过提高稅額,而應該是通過正常的經濟發展。商業部門的稅收應該根據商品的銷售量征收。公司稅應該通過生產水平和生產能力的提高而提高。關於增加人民負擔的其他稅收,如超額利潤稅、成本稅等,必須廢除或予以降低。

(三)必須通過開發最長在一年以後就能立即投入生產的自然資源的途徑作為新的收入來源。例如海上捕魚業、林業、玉米或煙草種植業等。

(四)控制外國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殼牌石油公司)的外匯收入,從而彌補外匯的不足。這就是說應該像對待種植業、工業等方面的外國企業一樣來對待外國石油企業,除非是政府分配的准予轉移的利潤和服務費等外匯外,一律不得自己掌握外匯。

(五)國家的支出應該根據優先發展建設的原則盡量有效地使用。盾或外匯基金的分配必須符合上述先後順序。

(六)為了逐步解決通貨膨脹,貨幣的流通必須要有計劃。這就是說發出的貨幣必須以更大的產值來平衡。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根據**貨幣和商品的相互關係**的原則,貨幣流通量不應該脫離社會所需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供應。

(乙)關於生產

人們已經足夠地了解 and 体会到,農業、種植業、礦業和民族工業的生產一般說來對印度尼西亞經濟的發展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從長遠來看,這種作用對於印度尼西亞經濟將擺脫對外國帝國主義經濟的依賴性還是仍然保持着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性質這一

問題是具有決定性的。換句話說，增加生產的政策應該是為了我國經濟的獨立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們必須繼續為爭取把殖民地經濟變成以農業和農場為基礎和以工業為骨幹的獨立的民族經濟而鬥爭。這一鬥爭有助於徹底實現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要求的政治鬥爭。

短期的國民生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它像精確的晴雨表一樣，可以用來衡量我們為把殖民地經濟變成沒有依賴性的民族經濟而進行的鬥爭已經達到了什麼程度。如果對各部門的生產下降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對工人階級加以責備，甚至實際上採取了使目前生產狀況更加下降的行動，而只高喊八月革命的目標、印度尼西亞的社會主義社會以及公正和繁榮的社會，那就無非是講空話而已。蘇加諾總統在《革命—社會主義—領導》中說得很對：“……生產、經濟是國家的命脈，因而反動派經常集中破壞國家這一命脈。”

因此，漠不關心的態度，責備工人階級的態度或者使目前生產更加下降的行動，就是意味著直接或間接地、自覺或不自覺地幫助了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內反動派的破壞工作。

相反地，如果我們能夠在質量上和數量上使生產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降低生產成本，創造發展生產力的條件，總之，假如我們消滅了在生產方面形形色色的經營管理不善的缺點，同時消滅在分配、交通、財政等方面經營管理不善的現象，這就意味着：

（一）具體實施了短期的衣食綱領；

（二）協助國家穩定金融狀況；

（三）一方面大量地節省外匯（假如能夠停止大米的輸入和減少其他消費品的輸入，尤其是紡織品的輸入的話），另一方面增加生產和輸出現有的主要原料，並輸出國內多餘的商品以擴大輸出品種，來增加外匯的收入；

(四)为把殖民地經濟变成不依赖于外国壟断資本主义經濟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經濟的斗争取得胜利奠定巩固的基础。

近几年来，几乎所有的生产部門的状况都呈現着一幅十分暗淡的景象。

政府本身在最近的互助合作議会上证实了这样的結論：“一九六二年的生产趋势是下降的，甚至是朝着崩潰方面发展的，尤其是國內消費品的生产和出口产品的生产。”

这一結論是对的。各生产部門的生产一般地說都比上一年下降，而只有一、二个生产部門的生产是“稳定”的或者稍有“上升”。从必須充分發揮全部生产能力的角度来看，我們的生产的确面临着崩潰的危險。經營管理不善的現象随处可见，統計工作和有关主要原料的生产数字的搜集工作也是如此，因此确定产量的时候，不能仅仅根据官方的正式統計数字，还應該估計活生生的现实，尤其應該估計到生产实践方面的因素。

生产实践中最有决定性的因素是生产的經營管理，它是由人和組織机构組成的，而人終究是最重要的因素。能否利用自然資源和現有的生产資料为社会創造有用的物資，取决于作为管理者和直接参加生产的劳动力的人。如果經營管理者对生产經營管理不善，生产就会下降而生产成本却很高。結果加重了作为消費者的人民的負担。

此外，目前生产下降和走向崩潰也是由于大量的貪污、浪費和走私所造成的，这是一种具有破坏性和十分反动的經營管理不善的現象。

在这里只举出四、五种最基本最主要的生产就容易证实以上指出的关于数字混乱和生产下降的情况。

十多年来由农业部(現在改为农业和土地部)管理和領導下的

大米生产，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肯定的可靠数字。农业和土地部规定一九六二年稻谷生产的数字为一千九百八十万吨，而中央统计局规定的数字却更低，只有一千七百八十万吨。“为了避免这一数字的混乱”，成立了以国家研究事务部部长朱内德为首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根据上述两个数字的平均数规定一个“折衷数字”，即一千八百三十万吨，但这个数字还远远低于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所规定的一九六二年生产指标即二千零四十万吨，甚至低于一九六一年的指标即一千九百二十万吨。

中央统计局本来应当十分仔细、谨慎和埋头苦干地工作，但看来它是更愿意走最简便的途径，它只是从一九六二年二千零四十万吨的生产指标中扣去相当于二百六十万吨稻谷的大米输入量，即 $20,400,000 \text{ 吨} - 2,600,000 \text{ 吨} = 17,800,000 \text{ 吨}$ 稻谷。这种完全不科学和非常轻率的工作方法大大地降低了中央统计局的威信，并使那些很认真地引用中央统计局的数字来分析情况的人发生错误。每一个爱国者、科学工作者和作家已经习惯于引用确切的数字，一定也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与其使许多人受骗和使用错误的材料，不如撤换中央统计局这种领导。

更不幸的是，外国人著书时就是根据中央统计局的这些错误数字，而这些书籍输入我国之后，官员、大学生等就引以为根据。

纺织品生产方面的数字更加令人费解和混乱。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统计数字——这数字已由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所通过而后来又经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机构加以修改——手工织机，根据纺织工人群众组织和私营纺织业公会直接提供的材料，大约有十五万台，机器织机大约有一万八千台，其中单幅机器织机九千台，双幅机器织机九千台。

不久以前民间工业部长第一助理宣布说，全部手工织机已增

加到四十万台，而机器織机增加到一万九千五百台，并解釋說，按这样的設備能力來說，实际上現在的生产潜力已經能够實現临时人民協商会議規定的一九六八年的指标（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日《民族經濟报》），即十七亿米，以一九六八年人口总数为一亿一千一百二十九万人計算，每人每年平均有十五米布。这与政府公布的数字相差多远！按政府公布的数字，一九六一年紡織品的产量为四亿二千八百万米，而一九六二年估計为四亿六千万米以上，这就是說只达到民間工业部长第一助理所說的應該达到的生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关于**砂糖**的生产数字虽然沒有出入，但是却显现了一幅十分暗淡的图景。临时人民協商会議規定的指标为九十万吨，但政府在它一九六二年的計劃中已削減为七十二万吨，而事实上一九六二年砂糖的生产估計低于六十万吨，这个数字同一九六一年（六十四万吨）和一九六〇年（六十七万五万吨）砂糖的产量相比，显然是下降了。

据政府公布的数字，一九六二年大农場**橡胶**的产量是二十三万吨，这个数字比一九六一年的产量（二十二万八千吨）可以說相去不远。但比一九五三年的产量（三十万零九千零九十八吨）却大大下降了。民間橡胶产量从一九六一年的四十四万吨下降到一九六二年的四十万吨。据农业和土地部长在印度尼西亚出口商临时联合会工作會議上所說，每年通过走私輸出的橡胶估計約为三万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民族經濟报》）。但是如果我們根据印度尼西亚的統計数字和馬來亞的統計数字来研究一下印度尼西亚輸出到新加坡的橡胶数量，就会发现两者有很大的出入：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〇年的七年期間，两者相差不少于一百零四万四千万吨，或者說是每年平均約十五万吨。这就是說，每年走私到

新加坡和馬來亞的橡膠數為農業和土地部長估計的全部橡膠走私數的五倍。

最近**椰干出口**方面的走私活動在蘇拉威西地區和安汶海面上已經達到異常猖獗的程度。這種情況是由於一些作為某些椰干走私集團的代理人的椰干中間商的不法行為和投機倒把所造成的。他們出的價錢遠比國營貿易公司向椰農收購的價格高。尤其是這些中間商還從外國帶進來許多非常“吸引”椰干生產者的商品，如紡織品、玻璃器皿、餐具、茶杯、毛織品、香煙等等。

這造成了椰干輸出額的大幅度下降。據農業和土地部長在“木本植物更新和栽植基金會”董事會議上所提供的材料，椰干輸出額從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年間每年平均五十五萬噸下降到一九五八年——一九六〇年間每年平均二十九萬噸，而以後又下降到十三萬噸（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印度尼西亞通訊社報道）。這些數字同發表在《商情統計一覽》上的一九六二年一、二、三、四月的數字（第48頁）出入極大。它造成的另一個後果是，國營貿易公司為滿足本國肥皂工業和椰油工業的需要而收購的椰干數量也大大地下降了。

關於其他出口原料如咖啡、茶葉、煙葉、棕櫚油、油棕果、麻纖維和木棉，只要調查下一九五七年到現在的數字就可以看出，除了咖啡生產稍有增加之外，其他的生產都下降了。

陸運和海运方面的停滯現象不但已經打亂了一般的商品的分配和流轉，而且也給生產造成混亂。

許多生產部門衰退、下降、甚至破壞的原因是眾所周知的，就是各種形式和表現的經營管理不善現象的到處發生。以大米生產方面的經營管理不善為例：稻谷中心站已支付了好幾十億盾，但並沒有取得相應的效果。進口的肥料品種很多，但使用時沒有因地制宜

宜。稻种在仓库里大量“发芽”，而分给农民的那一部分，却由于选种和保管不善而不能使用。农业生产委员会没有建立起来，也没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方面的有效监督。在纺织业生产、农场生产等方面也可以举出关于这种经营管理不善的现象的具体的和令人信服的例子。

在国营企业，不论是生产企业还是分配机构或者是国内外贸易机构，已经被经营管理不善这个瘟疫从许多方面所侵蚀，因而国营经济部门不可能对整个国家经济生活加以领导或者居于领导地位。国营经济部门没能取得应有的领导地位，其结果是私营的民族经济和进步的国内私营经济陷于混乱和面临破产的危险，以至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所迫切需要的国内资金和人力处于冻结状态，不能用于生产。在动员资金和人力时，必须坚决地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如强行合股，改换名字等等。

现有的私营企业十分缺乏主要原料、辅助原料和零件配件，其中大多数企业甚至得不到这些材料。而建立新的私营企业又有许许多多困难，因为要取得营业许可证非得经过复杂而麻烦的手续，同时事实上还有可能受到很重的营业税和财产税的威胁。

在提高粮食生产方面，我们党应该更加坚决地为实施对耕种者有利的《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实施《土地基本法令》而斗争，使真正最需要土地的雇农和贫农能够分到地主多余的土地，并且反对这些法令执行中的违法行为。

应当更加积极地建立劳动人民的合作社，尤其是生产合作社。应当把目前已经成为广大群众运动的“千方百计运动”开展得更有序、更有领导，并通过吸收更多的农业专家到这一运动中来和举办讲习班，进一步提高技术。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就和农业生产这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直接发生关系，我们就能为克服目前广大人民

群众遭到的生活困难做一些可能做的工作。当然只要在目前的政权和人民群众之间还存在着矛盾,这一切活动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丙)关于对外贸易

我国对外贸易仍然是国内经济生活的晴雨表,因为印度尼西亚经济纯粹依赖输入的性质还没有改变。国家财政收入还有百分之六十是依靠进出口。国内的生活消费品和重要生产原料实际上是靠进口的,而这必须由出口的收入来支付。

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事实表明,在输出方面除了石油外都下降了,即有一批重要的出口商品的输出总额和输出总值都下降了。一九六〇年到目前输出的情况可由下列数字表明:

1960 年	279 亿盾
1961 年	236 亿盾
1962 年(上半年)	97 亿盾

这一事实说明了在执行八年计划时期内的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外汇收入越来越减少了。结果国内消费和生产需要的传统进口商品,有很多被削减了。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大米生产指标没有完成,自然削弱了向其他部门支拨外汇的能力,因为在一九六三年显然没有能按八年计划的规定停止大米的进口。

除了石油外,一九六一年贸易收支的逆差是相当大的:

	出 口	进 口	逆 差
1961 年	235.58 亿盾	332.73 亿盾	97.15 亿盾
1962 年(上半年)	97.05 亿盾	144.78 亿盾	47.73 亿盾

相反地,石油输出却不断上升,外汇收入从一九六〇年九十九亿盾上升到一九六一年的一百一十七亿盾,而一九六二年的头八个月内就已经达到将近一百亿盾外汇。但是,这些外汇的收入仍然被外国资本所控制。

印度尼西亚显然还没有从在总额和总值方面不断上升的世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得到什么好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和遭到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竞赛中，印度尼西亚还没有摆脱目前正在动荡中的传统市场（读作依赖于资本主义市场）。为了摆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的影响，所有负责对外贸易的官员必须在经济方面认真地执行积极的独立政策，加强同新兴力量国家的合作。

鉴于出口收入非常有限，所以在一九六三年必须审查进口的商品。坚持给生产方面的工程项目以优先地位，为了有效地使用现有的外汇，需要停止奢侈品和其他非急需商品的进口。

为了通过消除国内外差价，推动出口而实行的《外汇许可证》条例显然已经失败了，给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坏的影响，这是由于《外汇许可证》规定的牌价太高，造成物价的空前高涨。出口商由于国内外差价而遭受损失的问题本来不应该通过《外汇许可证》条例解决。如其他一些需要国际支付手段的国家通常所实行的那样，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给生产者以奖金或补贴，而政府则以较低的国际价格输出其商品。这样，争取外币的目的可以得到保证，而国内物价也不致于因为《外汇许可证》条例提高牌价而引起波动。当然，必须注意外汇的使用，这里再重提一下，外汇必须有效地使用，不要像过去那样浪费于购买建设不需要的商品上。

保证更多的出口收入的工作之一，就是加紧肃清走私活动。有百分之几十的出口收入实际上没有进国库，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了。椰干、胡椒、橡胶、锡等等出口商品大批走私的现象，应当在一九六三年加以肃清，使国家从出口方面得到的收入能够有所增加。

为了便于监督向人民收购主要出口商品的工作并使之进行得顺利，国营出口公司必须加强主要商品的出口工作。各个地方出

口商品的收购工作由国营出口公司的分支机构进行，这样可以减少生产者由于中间商的欺骗而遭到的损失，而这些中间商有的同走私犯有关系。

为了实现这些，也需要有一批真正拥护《政治宣言》的人，即需要有爱国的、诚实的、有才能的、民主的和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人来管理对外贸易的工作。没有这些就不能推动出口工作和防止攫取国家对外贸易收入的行为。

(丁)关于人民的生活费用

有计划的建設能够胜利实现的条件，是生产者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热情。应该从精神和物质上激发这种热情。只是从精神上激发是会产生很大的效果的，因为能否提高生产率最后还是取决于劳动者的体力。在生产过程中始终需要给予劳动者最起码的条件，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并且体力上能继续从事生产。

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在发挥工人劳动热情方面存在着几个主要的缺点，而工人和农民都是进行建设的支柱。这并不是说在这期间工人和农民只是提出要求而不愿意自我牺牲。印度尼西亚的工人和农民没有等别人要求早已心甘情愿地作了自我牺牲。虽然工人和农民承受着下列统计数字所表明的日益繁重的生活负担，但是他们仍然关心并以实际行动来克服经济困难。下面是一个国家公务人员的四口之家在雅加达的生活费用的指数：

1953 年——100

1960 年——409

1958 年——202

1961 年(第二季度)——463

1959 年——293

这一指数充分地表明了，生活费用不断地上涨，而工资的增加却远远地落后了，或者远远地落在上述生活费用所反映的物价上

漲速度的后面。

农村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以下爪哇和馬都拉农村十二种主要食品和紡織品物价指数的上升情况可以說明这一点：

年 份	十二种主要食品	紡織品
1953 年	111	100
1958 年	263	238
1959 年	307	592
1960 年	388	926
1961 年	1,243	836
1962 年 (3 月份)	1,910	1,176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必須购买大部分或者全部生活必需品的农民，特别是貧农和雇农，遭受到生活費用猛烈上漲之苦。

一九六二年的現象更为严重。根据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底的統計数字，雅加达消費品价格上漲到一九六一年一月份的百分之四百二十。毫無疑問，价格上漲实际上远远超过官方的統計数字，而工資的增加平均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 * *

从上述关于經濟情况的事实可以看出，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我国的經濟情况在短期内将会好轉。但是，如果說目前經濟困难将是恶性的循环，是完全不对的。只要人民的力量充分动員起来，而經營管理不善的普遍現象被肃清，这些困难一定能够克服。

去年十月十日，党中央政治局发表一篇題为《**本着人民三項命令的精神为解决經濟問題而繼續前进**》的声明，得到了人們热烈的欢迎，他們广泛地談論这一声明，所有认真考虑我国經濟情况的人都把它当做重要的参考材料。声明中提到：

“在研究了国家和人民面临的暗淡的經濟情况后，是在經濟方

面采取根本措施的时候了。目前的技术行政措施或者財政金融措施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性质，不能指望它能治好目前財政經濟的严重創伤。”

在声明中我們也建議采取下面一些措施：

(一)整頓財政經濟机构，改变官僚主义的財政經濟机构的組織結構；

(二)尽快地成立民主的社会监督机构，如企业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分配和交通监督委员会、进出口监督委员会等等；

(三)保证工人、农民和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使他們能够发揚战斗精神，卷起袖子来克服目前的經濟危机；

(四)修复和改进生产工具和陆海空的交通工具，并根据資本、设备和人力的条件逐步地有计划地实行現代化；

(五)改变印度尼西亚的对外貿易政策，尽可能地扩大同社会主义各国貿易的数量和总值，俾能避免資本主义国家經濟危机所造成的恶果；

(六)在經濟方面反对新殖民主义，把威胁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独立的新殖民主义的問題，包括欧洲共同市場問題提到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亚非會議上加以討論；

(七)財政政策必須为生产服务，而不要反过来让錯誤的財政政策断送了生产。

在这一声明里我們也提出关于印度尼西亚經濟建設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則，即“建設政策必須建立在这样的認識的基础上，即发展国民經濟要以农业和农場为基础，以工业为骨干”。坚持这一原則就意味着必須首先实现彻底的土改，因为它是国民經濟建設的基础和資金的来源。只有实现了这一原則，印度尼西亚才能用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解决人民的衣食問題，同时才能够为国家工

业化奠定基础。

关于建設**資金**的来源，除了农业和农場之外，我国已經相当发展的矿业必須發揮重要的作用。

农业和农場是印度尼西亚主要收入来源（除了現有的矿业外），不重視农业和农場，我們的衣食永远得依賴于外国，而且我們从国外进口工业必需品的可能性仍然是很有限的。我們不願看到我国一直处于农业国地位并依賴外国市場，因此我們必須建立我們的經濟骨干，以便能够自力更生，而这一骨干就是工业。

因此，克服印度尼西亚經濟困难的**真正**出路并不是向外国乞求借款或者使印度尼西亚人民变成投在印度尼西亚的外国資本的佣人，而是必須**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經濟**，这就是說必須敢于通过牺牲城鄉少数大剝削者即官僚資本家、买办和地主的利益，而維護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来改变国内的社会制度。为此必須有与此相适应的政权，即以“納沙貢”为核心的互助合作政权。

每一个人民领导人面临着这样的問題：反对大剝削者来維護人民，还是反对人民来維護大剝削者。这是衡量他是不是革命领导人的标准。中間路綫是不存在的。

（三）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任务

第三項任务是反对新殖民主义。我們最近一次的代表大会已經闡明这个問題。生活证明，我們那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結論是正确的。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壟断資本家正在进行旨在操纵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經濟和政治的种种活动，目的是想保持他們在这些剛取得独立的国家的經濟中原有的地位。此外，他們还企图以經濟“援助”为名，夺取新的地位，設法

把新独立的国家拖入軍事集团，并在这些国家里建立軍事独裁和軍事基地。

美帝国主义利用“稳定經濟计划”的名目，企图在印度尼西亚建立变相的“爭取进步联盟”(这是针对拉丁美洲的)。其目的都是为了美帝国主义的“經濟稳定”和“政治稳定”。为了同样的目的，美帝国主义沒有忘記向印度尼西亚兜售所謂“和平队”。

在西伊里安問題解决之前，印度尼西亚人民把荷兰帝国主义当作头号敌人，同时把美帝国主义当作最危险的敌人。现在，荷兰殖民主义在西伊里安的历史肯定要完結了，如果仍然认定它是头号敌人，那就沒有意义了。在西伊里安的联合国临时行政机构与其說是为荷兰的利益服务，不如說是为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因此，目前印度尼西亚人民最危险的头号敌人是美帝国主义。从美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影响，从它的投資，从它的軍事和文化滲入来看，它都超过其他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目前正千方百計地忙着用煽动性的口号扩大和巩固它在印度尼西亚已有的經濟基础和政治影响。

它所采用的方法是：

甲、增加現有的美国投資，特别是在石油工业方面的投資；

乙、采取新的方式扩大美国的經濟“援助”。

从壳牌石油公司(它的資本有一部分是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投資的增加，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投資的增长情况。从一九五四年起到目前为止，这些石油公司的投資增长情况如下：

壳牌石油公司	增加 78,000,000 美元 (30,000,000 英鎊)
美孚石油公司	增加 40,000,000 美元
德士古石油公司	增加 47,000,000 美元

根据美国大使琼斯向美侨协会所作的报告，从一九五〇年到現在，美国提供的經濟“援助”已达六亿三千九百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消費資料。这一切就是美帝国主义已經得到的立足基础。

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作新的努力来取代荷兰帝国主义的地位。美帝国主义利用爭取“經濟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口号，制定所謂“特別援助”計劃。据說，这种援助是长期性的，印度尼西亚似乎已經变成荒地，无法自力更生，必須永远依賴外国的援助。他們所說的“政治稳定”，其实就是在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他們的人”的稳定。

这种附有政治条件的援助，損害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自由和主权。

印度尼西亚官僚資本家和买办对外援的态度是不公正的。他們濫用职权，妨害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則实行援助。他們大吹大捧帝国主义的經濟援助，因为这种援助总是帶有加强城乡大剝削者私人的經濟基础的东西。

由于經濟和財政方面經營管理不善的現象越来越普遍，所以外援的使用显然不能保证使我国的經濟发展获得最大的好处。除了获得了美国及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相当多的援助之外，社会主义国家的不附任何侵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主权的政治条件的援助还在繼續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也不是建設經費的主要来源，仅仅帶輔助的性质，它們希望印度尼西亚在短期內能够自力更生而不必老是依賴外国的援助。

社会主义国家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的历史还不长，但是，如果在我国的經濟和財政領域中沒有破坏活动和經營管理不善現象的話，那么这种援助是足以使經濟建設順利进行的。根据亚洲与远东經濟委员会的統計，社会主义国家向印度尼西亚提供的援助

如下：

到 1957 年底	137,000,000 美元
到 1960 年底	466,000,000 美元，或上升为 340%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又有增加。

美援的信用在經濟落后的国家中日益下降，这是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日益扩大的因素之一。亚洲与远东經濟委员会的統計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給落后国家的援助有如下的增加：

到 1957 年底	822,000,000 美元
到 1960 年底	3,198,000,000 美元，或上升为 390%

目前美帝国主义还想通过私营建設銀行把它拟議的新援助交给它的同謀者。美帝国主义的援助的目的在于巩固它的走狗的經濟利益，以取消应当占领导地位的国营經濟的作用。这是和《政治宣言》相抵触的，即使美帝国主义表示“贊同”《政治宣言》，琼斯甚至說要把美国資本主义企业(私人企业)同“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的关系协调起来。

现在，事实越来越证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互助合作議會討論私营建設銀行条例时所提出的警告的正确性，那就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資本渗入到私营建設銀行的危險是存在的。在这方面，我們必須保持警惕，并且制止外国帝国主义通过私营建設銀行进行的冒险行动。

荷兰帝国主义仍然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危險的敌人，因为它仍然拥有为数相当大的投資(巴达夫石油公司，等等)，因为它还要就已被接管和收归国有的企业的問題提出无理的要求，因为它还保有旧的政治关系，并力图改头換面重新建立这些关系。

最近，英帝国主义出来推行它的馬来西亚計劃，西德和日本帝国主义也出来实行它們的經濟渗入，这一切必然引起印度尼西亚

人民的警惕。但是，在印度尼西亚进行活动的所有帝国主义当中，印度尼西亚人民最危险的头号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反对新殖民主义危险的斗争应以美帝国主义为首要对象。

有人怀疑并且问道：难道新殖民主义对印度尼西亚也是严重的危险吗？这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印度尼西亚是通过武装斗争获得民族独立的，这和印度或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不同。我们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十分严重！**我们这样回答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证明，对新殖民主义的危害性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六年多以前，也就是在一九五六年七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我们基于深刻的分析，得出结论：在完成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要求方面有三种力量和三个方案。

第一种力量，顽固力量，也就是反动力量；他们的方案要把印度尼西亚变成仅仅在形式上独立，而在实际上则向帝国主义屈服，并且维护外国大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的国家。他们说这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目的。

第二种力量，进步力量，也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他们的方案要求从印度尼西亚土地上清除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同时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坚决贯彻“土地归农民”的口号。

第三种力量，中间力量，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的方案是反帝反封建的，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要求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变革，使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发展。

这三种力量，在生活各个方面，无论是在政治方面或者是经济、文化等方面，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搏斗。最近，这种搏斗在经济方面，尤其是在克服目前经济困难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和

突出。

頑固派认为，只有印度尼西亚为外国投資打开大門的情况下，国内的經濟困难才能得到克服，因为有了大量的外資在印度尼西亚經營，我們就可从中抽得巨額的稅收作为国家建設的資金。頑固派还談到了靠帝国主义国家貸款的所謂“穩定經濟計劃”。他們非常积极地聘請帝国主义国家的专家来从事各种研究，把“国际貨幣基金組織”之类的建議看成是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們投靠具有剝削、統治和保持落后状态的政治綱領的“国际貨幣基金組織”。这样一来，在克服經濟困难中，他們当然根本不依靠人民，他們指責人民是經濟困难的根源，說什麼这是因为人民喜欢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頑固派根本不是爱国主义者，而是經濟領域中的外国代理人 and 叛徒。

頑固派主要包括：在政府中还占据重要职位的右翼社会党人、官僚資本家、买办和中間集团的右翼分子。中間集团的右翼分子本身没有什么方案，但是巧妙地暗中采納并贩卖右翼社会党人的方案。

进步人士认为，應該通过动員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力量和利用印度尼西亚的天然資源来克服印度尼西亚的經濟困难。印度尼西亚的資源丰富，土地十分肥沃，人口众多，人民聪明和勤劳。这一切都是建設我国民族經濟取之不尽的源泉。把印度尼西亚建成为一个人民生活幸福的国家的一切客观条件都是具备的。

現在，进步的政治与經濟方案已經有了，而且甚至已經被正式規定为国家的方針。目前所需要的是建立与我們所要建立的經濟結構相适应的政权。然而目前我們还没有这种政权。这种情况也就成为克服目前經濟困难的主要障碍。缺乏这个条件的原因，正如加諾兄經常說的，是因为在某些国家机构的成員的心中 and 头脑

中还有严重的恐共、恐左、恐人民、恐工人和恐农民的病症。

进步人士认为，真正的經濟援助只能从同我們一起进行反帝斗争的那些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那里取得。即使是这种援助，这种外在因素，也只不过是援助而已，就是說，它对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发展不能起决定性作用。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印度尼西亚人民自己的努力、办法、智慧、勤劳、团结和毅力。进步人士不仅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而且在經濟方面也是爱国主义者。

中間派不表示拒絕进步人士的观点，他們甚至喜欢說：應該信賴自己的力量，印度尼西亚有丰富的天然資源，印度尼西亚人民是勤劳和有能力的。但是他們公开地或在內心里說，“信賴自己的力量”的道路太困难了，時間太长了。因此，他們說我們應該寻找貸款或者是“沒有危害性”的外国投資的外援。

中間派的观点看起来同頑固派的观点不同。的确，就方案而論是有区别的，但是这一段时期的經驗表明，在实际执行中两者都是一回事，都是使自己依賴外“援”。一旦获得外“援”，中間派就会“忘記”“信賴自己的力量”的道路，結果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为劳动人民創造发揚战斗精神，卷起袖子来克服經濟困难的政治条件。

但是，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并不是中間力量的所有集团都“忘記”了“信賴自己的力量”的道路。中間力量的左翼逐漸地認識到，克服經濟困难的唯一途徑就是和进步人士一起消除經營管理不善的現象，进行大規模的整頓，他們甚至还同意成立“納沙貢”內閣。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殖民主义的危險是我国的严重危險。这种危險来自热中于邀請外国投資并想要实行靠帝国主义貸款的“穩定經濟計劃”的反动派。这种危險也来自同样为“沒有危害性”的外国資本打开門戶的中間力量。

無論是外國投資、靠帝國主義貸款的“穩定經濟計劃”或者“沒有危害性”的外國資本，這一切都是以“印度尼西亞社會主義”的名義邀請的，所以危險性就變得更加嚴重。這樣一來，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甚至於在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都不再存在什麼區別了。

因此，每一個印度尼西亞的愛國者都不能對我國的經濟問題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因為威脅着我們祖國的危險正是由此而產生的。當然，從別的方面來的危險，如馬來西亞新殖民主義，我們也必須加以反對。但是這種危險人民很快就能識破，因而要動員人民起來反對它也容易。帝國主義通過“不知不覺”的、有些人甚至覺得是一種美妙的經濟途徑，吞噬和蚕食我國的獨立，其結果是，有朝一日當我們醒來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我們的國家已經變成一個主要的新殖民地國家了。

因此，在經濟領域的鬥爭中，我們同樣必須遵循愛國主義、人民的三點命令和《政治宣言》的精神，即信賴自己的力量、大公無私和為建設擺脫帝國主義的民族經濟進行奮不顧身的鬥爭的精神。讓我們把經濟問題變成全體愛國者的問題吧！

這就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三項任務。

三項任務的核心是克服經濟困難。所以我們共產黨人熱烈歡迎蘇加諾總統的“勝利年”的演說。總統在演說中表示有能力解決“經濟問題的困難”，並且指出主要的弊病在於“恐共、恐左、恐人民、恐工人和恐農民的病症過於嚴重”。

如果我們不能有效地解決經濟的困難，那麼我們就不可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勝利，例如我們就不可能建設西伊里安，帶給人民和國家以真正的安寧，等等。相反的，在西伊里安人民當中甚至會產生不滿情緒，治安不寧的情況將繼續存在，等等。

如果我們不能有效地解決經濟的困難，那麼頑固派，首先是右翼社會黨人和官僚資本家，就有可能更加容易地通過一些重要官員向政府提出他們的新殖民主義經濟方案。這些重要官員沒有自己的方案，他們是暗中採納和販賣方案的能手。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中間派很容易囫圇吞棗地接受那種新殖民主義經濟方案，結果他們就和頑固派採取了同樣的行動。

在這場劇烈的鬥爭中，我們一步也不能後退，我們必須使我們的經濟方案即有領導的經濟或互助合作經濟的方案贏得勝利。這個方案的基本內容就是反帝和反封建的經濟，這是在《建設計劃大綱》（臨時人民協商會議第二號決定書）中明確規定了的。

近來，在克服經濟困難中，我們在許多人的思想方法中看到了兩種進步：

一、人們已經普遍接受這樣一種思想：僅僅在金融方面採取措施是不能解決通貨膨脹問題的，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採取增加國內生產的方法。幾年以前很多人還不容易接受這種思想。強調生產對解決通貨膨脹問題的重要性就意味着必須真正認識到《政治宣言》中所說的工人和農民是革命的基本力量這一句話，如果沒有工人和農民，就不可能有為克服通貨膨脹所需要的生產。所以，如果要真正克服通貨膨脹，就必須徹底肅清恐工人病和恐農民病，停止濫發“號令”和採用同工人和農民一起商量和協議的辦法。

二、人們已經普遍接受這樣一種思想：我國經濟問題的解決不能和其他問題、首先是政治問題的解決分開來。換句話說，必須建立與我們所要建立的經濟結構相適應的政權。歷史或目前的事實都證明，一定的經濟結構需要與它相適應的一定的政權。目前，臨時人民協商會議賦予印度尼西亞人民的任務是建立一個進步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和民主的、全體人民通過互助合作來實現的經

济结构，其中既有社会监督，也有社会支持。但不合理的是，我們目前的政权并不是能够执行这一经济任务的政权。总之，在我們要建立的經濟结构与我們目前所拥有的政权之間，还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只能通过成立以比例代表制为基础的互助合作內閣来解决，这种內閣是总統方案（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的话）、《政治宣言》和临时人民协商會議第二号决定书附录甲有关政权問題的部分提出的要求。当这个矛盾还没有解决的时候，談論克服经济困难，建設民族經濟，更不用說社会主义，都是毫无实际价值的。

从一九六二年末到一九六三年初，成立“納沙貢”內閣的要求是很强烈的。在这段期間內，成立“納沙貢”內閣的要求第一次得到“納沙貢”的支持。在此之前，只有共产党人、进步的群众和加諾兄談到这个問題（加諾兄在总統方案中用了“互助合作內閣”一詞）。現在，成立互助合作內閣或“納沙貢”內閣的要求也得到民族主义政党（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印度尼西亚党，等等）、宗教政党（白尔蒂伊斯兰教党以及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联盟党的地方领导人，等等）的支持。印度尼西亚新聞工作者协会也支持这一要求。所有这一切表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表现了我国的政治局势的新发展，表现了人們对国家大事、人民的事业以及寻找克服困难的出路的认真負責的态度。

要求成立“納沙貢”內閣呼声的高漲使得反动派处于更加孤立的地位，也說明了中間力量向左发展，进步力量更加壮大和巩固。这就意味着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团结更加强大了。

情况就是这样。尽管反动力量和頑固力量还存在而且是不可以忽視的，但是，在报告談到的時間內，在动员群众镇压叛乱的斗争中，在应付西伊里安問題的战斗准备中，在反对乡村地主的斗争中，在反对經營管理不善的現象的斗争中，以及在反对由于处于紧

急状态而可能造成的为非作歹行为的斗争中，反动力量或顽固力量遭到了人民的革命行动的许多打击。

由于顽固力量遭到失败，由于中间力量的群众和它的一些领导人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顽固派在中间力量右翼中的朋友也遭到了失败。

进步力量之能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这首先是因为农民和工人的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以及革命知识分子的新觉醒。进步的群众运动在各个战线上都有了进展。

由于进步力量和民族阵线日益发展和巩固，所以继续争取在人民政治自由方面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以及争取成立互助合作内閣、建立民主的地方政权、废除战时戒严法令和实行自由民主的普选等等的条件也变得更加有利了。

要求成立以“納沙貢”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閣是科学、客观、民主和爱国要求。假如不同意成立“納沙貢”内閣，那么有关“建国五原则”、一九四五年宪法、《政治宣言》、互助合作、公正繁荣的社会、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有领导的民主、有领导的经济以及达到革命目标的和平和民主道路等等的言论，都是一种虚伪的表现。

尽管希望成立以“納沙貢”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閣的要求是科学、客观、民主和爱国要求，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仍然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成立以“納沙貢”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閣是力量对比的问题，而且没有一个阶级是会自愿地同其他阶级一起分享政权的。不仅反动的资产阶级不愿意同其他阶级分享政权，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如果不是被迫——也不会愿意同无产阶级分享政权。所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不要有这种想法：以为参加政权的问题仅仅是科学的真理问题、仅仅是客观性的问题、仅仅是基于民主原则和爱国的公正问题。

目前进步力量确实是强大了，但是中間力量加上右派力量仍是較大的。的确，一部分中間力量，由于群众的压力，已經願意在一个“納沙貢”內閣里同进步力量合作，再也不顾頑固派的威胁了，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中間力量依然是頑固派的俘虏。

为了改变力量的对比，以便为成立以“納沙貢”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內閣創造足够的条件，我們應該更坚决执行我們六年前制訂的路綫，即**尽力和不倦地发展进步力量，团結中間力量，孤立頑固力量**。我們必須通过实行“五更”，即**更勇敢、更机智、更警惕、更坚决和更埋头苦干**来执行这条路綫。

对于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地主、买办和官僚資本家——來說，“納沙貢”內閣是不科学、不客观、不民主和不爱国的，因为他們持有符合他們本身利益的另一种尺度。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加諾兄已經一再強調革命的民族团結的必要性和以“納沙貢”为核心的絕對必要性，但是頑固派和中間力量的右翼，包括一些自称“忠于总统”的政府重要官員却不顾这一切，甚至暗地里反对革命的民族团結和“納沙貢”。为了使人不容易看出他們实际上是反对苏加諾总统和人民的，这些官員也喜欢念念有詞地談論“建国五原則”、一九四五年宪法、《政治宣言》及实施这一切的方針政策。但是，他們的主要特点是完全不提民族的互助合作的必要性和“納沙貢”核心的絕對必要性。实际上，不談論这一切就等于什么都沒有說，因为沒有民族的互助合作和“納沙貢”，《政治宣言》等等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很清楚，在爭取实现《政治宣言》的斗争的同时，絕對必須进行反对虚伪的《政治宣言》派和假的《政治宣言》派的斗争。

我們共产党人不代表老朽力量，我們代表新兴力量。所以，我們將不停地宣傳革命的民族团結的必要性和“納沙貢”核心的絕對必要性。革命的民族团結和“納沙貢”最后必将胜利和实现，这不

仅是因为人民贊同和拥护它，而且首先是因为人民在为之斗争和牺牲。利己主义、反动行为和得不到人民拥护的頑固派必将失敗。

建立“納沙貢”內閣是任何一个真正希望通过和平和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所必須采取的第一个政治步骤。假如不贊同建立“納沙貢”內閣，那么一切有关“和平和民主的道路”的言論就純粹是空話。

当然，“納沙貢”內閣还不是在短期內使情况有所改善的絕對保证，但是这种內閣的成立表現人們有集中全民族力量的誠意，而且是反对恐共病的有效步骤。的确，“納沙貢”內閣不是阿拉丁的神灯，但是这种內閣的成立必将为克服困难提供可能性，而有这种可能性总归比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要好，我們这个时期以来所經歷过的历届內閣就都沒有提供这种可能性。

为了克服目前的經濟困难，必須审查和整肃政府部門、經濟部門和財政部門的国家机构以及国营企业的領導。在这方面，我們提出过要求，希望成立苏加諾总统領導的、以“納沙貢”为核心的互助合作整肃委员会。整肃之所以需要，不仅是因为我們要糾正我們的疏忽，即在一九四五年革命初期我們沒有坚决地以嶄新的机构代替殖民地的机构，尤其是因为由于圓桌會議協定的后果和实行了五年多的紧急状态法令的后果，为数甚多的人“任用不当”，即一大批利己主义者在政府部門、經濟部門和財政部門占据了不适当的职位，以致成为經營管理不善現象的禍根。

在整肃的問題上，反动派竭力避免人事的更換。他們一直在整肃机构和思想整頓的問題上糾纏，似乎机构和思想同人事毫无关系。他們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提出問題，是由于他們想让現在政府部門中还掌握着許多陣地的反动分子原封不动，使整肃机构和思想整頓的事仅仅是在口头上讲讲而已。这样一来，他們就可以

欺騙整个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我們革命派必須強調，最重要的是人事的更換，必須用那些願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和真正是《政治宣言》派的人来代替那些“任用不当”的人。有了这种人，机构中的缺陷就能得到弥补；相反的，任何机构，如果有那些苏加諾称之为“脑子和心里充滿污秽、生滿锈、不能适应《政治宣言》的人”在里面，都不能用它来为人民服务。

当然，我們不應該低估思想整頓在把落后的人的思想改造成进步思想方面的重大意义。但是，这样的改造必須正確地进行，現在已經有进行这种全面教育的指示，即苏加諾总统的“胜利年”演說提出的“九点指示”。我們必須繼續努力把《政治宣言》和人民群众全面地結合起来。

为了實現三項任务，我們應該抱着敢于冒風險的精神，應該比以前更加勇敢，为爭取成立“納沙貢”內閣，實現各个方面的整肅和正確地进行基于“九点指示”的全面教育而繼續前进。拒絕这三个条件，就等于反对巩固已經取得的胜利，就是希望我国的經濟情况繼續恶化，让新殖民主义統治我国。

二、加强国际反帝統一战綫， 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同志們：

国际形势表明，加諾兄称之为新兴力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好和平的陣綫正越来越发展，并且不断取得胜利，从而迫使帝国主义者后退。

今天西欧的形势清楚地說明了帝国主义陣营的内部冲突是多么尖銳，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是多么緊張。

美国希望有一个统一起来足以对付社会主义阵营的欧洲，但是这个统一的欧洲必须在军事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依赖和屈从于美国。美国对于想拥有自己的核力量的英国、法国和西德的野心很不高兴。美国和西欧国家一起组成由美国领导和大权独揽的……一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边核力量。在美国的“大战略”中，的确要使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只起常规步兵的作用，而美国则是拥有无可争议的“核牙齿”的独一无二的霸主。

因此，美国强施压力冀使同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能够参加欧洲共同市场，并从而参加成立一个欧洲政治联盟；这样，美国就能够同时把英国在英联邦和非洲的殖民利益夺到手中。

但是，戴高乐在阿登纳的帮助下并不愿意屈服于美国的霸权。这两个欧洲的老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彼此互相需要。他们把英国看作是美国的代理人，一个可疑分子，必须拒绝它进入欧洲共同市场。西德由于它自己的工业市场的利益，它自己实际上并不拒绝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但是由于戴高乐顽固地持拒绝态度，也无法帮助英国进入欧洲共同市场。在戴高乐发表了使法国成为独立核力量的核预算之后，几天前签订了波恩—巴黎协定。这项协定实质上意味着建立一个环绕着波恩—巴黎轴心的把英国排斥在外的“小欧洲”，它在一定限度内不依靠美国。而欧洲共同市场的其他成员也的确担心这个戴高乐—阿登纳（轴心）变得越来越强大。今年一月底，他们作出了拒绝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决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谈判已正式停止。这么一来，肯尼迪的“大战略”的确可以说是失败了。华盛顿的官方反应确是说，有了这个波恩—巴黎轴心，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就感到不再安全了。西方联盟不论怎样竭力煽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暂时出现的意见分歧，它自己正在崩溃、在瓦解的这一事实是再也无法掩盖的了。

在报告所談到的時間內，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許多确实是非常重大的成就和发展，其中包括苏联成功发射了两艘編队飞行的宇宙飞船。这又一次证明了在关于火箭的科学和技术方面，苏联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绝对优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連續几年的巨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由于社会主义經濟的威力，現在已被出色地克服了，这特別证明了人民公社的非凡的生命力。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已取得了輝煌的胜利，使世界帝国主义的地位发生了动摇。

老撾人民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越南南方的人民军队取得了非常迅速的进展。尼赫魯的虚伪的“不結盟”政策，破产的亲帝国主义的政策，特别是在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間的边界爭端方面，越来越遭到揭露。蔣介石匪帮最近在广东的軍事冒险已被粉碎。在非洲大陆上，誕生了四个新的独立国家：阿尔及利亚、烏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在南北罗得西亚、安哥拉、怯尼亚、桑給巴尔、南非、莫三鼻給、巴苏陀兰、貝专納以及斯威士兰，人民的反抗越来越强大有力。

英雄的古巴人民在各国人民解放史上写下了光荣史詩。依靠人民的磐石般的团結，对人民力量——这是最强大的武器——的充分信心，依靠自己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依靠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領導下的革命政府以及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进步人民的巨大援助，古巴坚定不移地屹立着，沒有向美帝国主义者的任何侵略或威胁屈膝。古巴人民正在坚决地、毫不动摇地走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古巴人民坚持卡斯特的五項要求，保住了自己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挽救了他們的社会主义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說，最近的加勒比海事件的基本經驗是：“不要相信帝国主义者話”，必須用武力，而不是通过合作或过分的妥协，来对付和战胜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卡斯特罗同志这样說，的确是

常正确的。

古巴革命和它所产生的两个哈瓦那宣言鼓舞了正在保卫这个革命的整个拉丁美洲人民的行动，进一步推动了委内瑞拉、厄瓜多尔、智利、哥斯达黎加、危地馬拉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人民反抗以美帝国主义者所谓的“争取进步联盟”为形式的奴役政策。

去年十二月我们的邻居北加里曼丹人民发动起义，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独立国家，我们感到极大的喜悦。这个英勇的斗争不仅是北加里曼丹人民的解放道路，而且也是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巨大援助，因为这样，为了包围印度尼西亚而要建立的所谓马来西亚联邦这道堤坝遭到了冲击和突破。虽然英帝国主义及其傀儡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将继续企图用他们的马来西亚来包围印度尼西亚，但是将被马来西亚化的人民已经准备向它发动猛攻，同时印度尼西亚人民坚决地全力支持这个正义的斗争。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斗争，的确是非常正确的，因此必须继续加强这种支持。

所有上述事件清楚地说明，国际形势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民主、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力量的。

但是帝国主义不想就这样投降。他们的处境愈是窘迫，他们就愈加疯狂地进行侵略，以便保持自己已经摇摇欲坠的殖民地位。他们继续对老撾人民进行颠覆活动，一再企图阻挠老撾人民实现民主的统一。在越南南方，他们在继续加紧进行不宣而战的殖民战争。在刚果，他们在继续进行捣乱，镇压人民的解放运动。在安哥拉和非洲的其他地方也没有例外。美帝国主义者继续在窥伺着古巴，待机发动军事进攻，对它进行猛扑。他们继续把大笔美元花在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身上，以使他们能够扩大他们的破坏活动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

力量和团結，閹割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帝国主义者正集中全部精力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实现他們罪恶計劃的主要障碍。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的主要危險——現代修正主义者的活动面前，我們党必須不断地揭露他們，不論他們在什么地方和以什么形式出現。击败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就是維護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的团結——加强热爱和平的国际反帝統一战綫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現的裂痕面前，兄弟党之間有必要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在相互尊重各党的完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进行兄弟般的协商和討論。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共同文件——說：“当某一个党遇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问题时，由这个党的领导方面向有关党的领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会談和协商。”

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說来，像对其他共产党一样，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是最近和最根本的共同文件；今天，它們是每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处理党与党之間的关系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爭取民族独立、民主、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普遍斗争方面必須忠实地遵守和执行的共同指南和綱領。在实践中忠于宣言和声明是衡量一个共产党的純洁性的主要尺碼。

我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从来不相信，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帝国主义者面前进行論战和互相指責，就会更加容易地解决意見分歧。在邀請其他兄弟党参加的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必須显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在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思

想一致和意志一致。我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通过的決議中明确地說：我們党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不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态度是非常正确和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我們就沒有参与制造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彼此进行攻击这种恶劣的先例。随着時間的推移，这种态度的正确性已日益得到了证明，党员群众以及我国劳动人民确实深深感到，这种态度是多么正确。

我們在一九六一年預料將出現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互相发动攻击的恶习，这种預料已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及德国統一社会党最近举行的各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实所证实。这些代表大会沒有显示全世界共产党人在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思想一致和意志一致。相反地，虽然通过了一些好的決議，这些代表大会在世界无产者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是共产主义大家庭中的裂痕和爭执。請看看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代表是在如何肆无忌惮地利用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和德国統一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讲坛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吧！

最近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切爭吵都会降低不論什么地方的共产党人的威信，削弱世界范围内的共产党的团结，使共产党人对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和一个兄弟党的成就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样就使他們不那样努力去向兄弟党吸取教益，对兄弟党的成功或失利不够关心。这是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必須充分了解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的現象。我們党了解这种現象，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向党的干部大力強調指出，尽管同其他一些党有意見分歧，我們仍旧必須热情地向兄弟党学习，学习它們成功的經驗，也吸取它們失敗的教訓。我們必須防止对同我們有

意見分歧的兄弟黨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我們必須繼續滿腔熱情地對待同我們有意見分歧但是仍然反對帝國主義的同志，因為我們今天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一個共產黨人或者一個共產黨不論有多麼不好，只要他還反對帝國主義，總比一個資產階級分子或資產階級政黨要好些。

有些人因為我們不願意參加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所有這些爭吵，就指責我們不想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方式解決原則問題。這是無中生有的說法。帝國主義者也在大事挑撥，希望我們參加製造爭吵。

我們希望，而且是非常希望原則問題能夠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方式解決，也正因为這樣，我們才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提出我們主張召開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會議的意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歡迎赫魯曉夫同志所說的目前的爭論是一個家庭內部爭論這番話，而且我們建議這種家庭內部的爭論也應當以家庭的方式來解決。我們也歡迎赫魯曉夫同志代表蘇共中央委員會在最近舉行的德國統一社會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所發出的停止共產黨之間的論戰和停止利用一個黨的代表大會來攻擊另一個黨的呼聲。

我們不希望的，並且也永遠不會為我們所同意的是按照社會民主黨或者無政府主義的方法來解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意見分歧。社會民主黨人慣於以自由主義的方式解決問題，包括黨的內部問題，其結果是使他們的追隨者分裂成為許多派系。他們沒有紀律，他們慣於玩弄陰謀詭計，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和自己派系的利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社會民主黨人中間，當然是件好事，但是如果發生在共產黨人中間，那就不好了。無政府主義者的習慣是不按任何規章辦事，如果他們參加了組織，他們就破壞規章，製造糾紛，這是對人民不利的，儘管他們以為他

們所制造的糾紛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我們共產黨人慣于過紀律生活，根據我們自己自覺地規定和遵守的規章生活。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已經有了這些規章，其中最近的一個就是一九六〇年的共產黨人的聲明。

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這許久來一直在號召，而且將來仍然要號召黨的幹部和黨員，通過我們所能獲得的材料學習彼此間存在分歧的兄弟黨的看法。我們學習這些看法，目的在於從中吸取教訓，以加速印度尼西亞革命的勝利和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人民日報》編輯部甚至已經开辟了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專欄，其目的是提供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已經發生的問題的參考材料。但是當我們歡迎赫魯曉夫同志在德國統一社會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提出關於要求停止爭論和互相責難，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局勢平靜下來，以便能夠在適當時候召開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的會議這個號召時，這個專欄便停辦了。

我們希望所有的爭論和互相責難，不論是在言論還是文章中，在反對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還是反對其他共產黨和工人黨方面，都將真正停止下來。我們並不是天真，但是我們向所有國家的真誠希望在八十個共產黨和工人黨聲明的基礎上恢復世界共產主義大家庭的和諧的共產黨領導人的理智發出呼喚。

中央委員會的這種態度受到我們黨的黨員的熱烈歡迎，因為它表明黨的中央委員會充分相信它所持的態度是正確的，它教育黨員在對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問題上採取批判、謙遜、自信和真誠的態度。

但是我們也提醒我們的黨員，我們當然不應當卷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意見分歧的無休止的討論中去，而使我們的隊伍在反帝鬥爭中喪失昂揚的鬥志。反對帝國主義本身及其走狗，要

比知道各兄弟党間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有效方法方面的意見分歧重要得多。因此，在討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見分歧时，我們也要有一定的限度，否則，在我們的队伍中就会产生疏忽，那就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

就像我們在我們上次的代表大会上說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見分歧只是在大約拥有四千三百万共产党员的九十来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强大运动中的一个暂时現象，这个运动領導着社会主义国家，并且領導着巨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修正主义者尽可以說，馬克思主义过时了，但是事实是，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馬克思主义已經显示出而且正在显示出它比那些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哲学优越，显示出它比所有其他的政治和社会概念优越。这是在世界範圍內以及在我們自己的国家內每天每时都发生的事。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正确地指出，現在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义，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要求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进一步揭露目前正处于依賴美帝国主义“援助”地位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并且对它展开积极的斗争。

我們的党作为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将继续反对古典的和現代的修正主义。停止反对修正主义就意味着不再走革命的道路，意味着不去认真地对帝国主义和其他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而这样行动的党在它自己还没有发现它已經背棄人民以前就会被人民群众所拋棄。

一个患有修正主义毛病的共产党是不可能变得强大起来的，相反，它将变得越来越軟弱，它将日益丧失它的战斗精神，而它的内部分裂将变得越来越严重。情况只能是这样，因为修正主义并不动員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反对他們的敌人，而是把同人民的敌人妥協置于首要地位。一个不能动員自己、不进行殊死斗争而且

沒有受到革命斗争的烈火锻炼的党，就会不断地失去新鲜的血液，不断衰萎，越来越脱离群众，而它的内部团结也不会得到锻炼和加强。一个不是果敢地和富有战斗精神地进行斗争的共产党，只能产生披着共产党人外衣的思想陈腐和僵化的官僚主义者，而不会产生真正的人民领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须继续保持反对修正主义的光辉传统，这个传统是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立之初我们就开始具有的。

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同时，我们还进行了并且仍将继续进行反对教条主义——古典的教条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的斗争。长期以来，即自从我们的党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重建以来，我们就一直对古典教条主义展开斗争，因此今天我们的同志们已经了解，要硬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上的“现成”公式，而不考虑到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情况，那是错误的。在最近这段时期，我们成功地同现代教条主义，即对各兄弟党现在的经验、结论和纲领采取不加批判的态度的作法进行了斗争。当然，我们必须研究各兄弟党最近的经验、结论和纲领，但是其目的并不是要是不加批判地、愚蠢地和不负责任地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党的东西。这样一种态度，即这种现代教条主义的态度，会很容易地使我们的党同群众和民族脱离，并且使我们的党不可能成为保卫群众和民族利益的战士。

古典的和现代的修正主义与古典的和现代的教条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对这两者都必须不断地加以反对。这两者都是危险的，但是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不去反对它。问题并不是在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正像不能在鱼毒和蛇毒之间进行选择一样。在这两者之间是不能进行选择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必须始终不懈地对它们展开进攻和冲击。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要是认

为反对修正主义的人就是教条主义者，而反对教条主义的人就是修正主义者，那都是錯誤的。現代修正主义者甚至非常可能同时又是現代教条主义者，因为这两种人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主观主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須繼續不断地反对古典的和現代的修正主义与古典的和現代的教条主义，他們必須坚持不懈地使自己成为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而又能灵活运用这些原則的共产党人。

事情的确應該是这样，因为如果不能坚持这些原則，就不可能灵活运用这些原則，而如果不能灵活运用这些原則，那么坚持这些原則就沒有什么用处了。只有灵活性而不坚持原則就意味着机会主义，坚持原則而沒有灵活性則意味着宗派主义。無論是机会主义还是宗派主义都决不能允許它在共产党人的队伍中有立足之地。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將繼續不懈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一致和崇高威望而斗争，成为这个强大的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言論和实际行动中貫徹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为他們相信，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爭取民族独立，爭取民主、和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面加强世界各国人民的运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既是爱国者，同时又是国际主义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作为爱国者將繼續为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运用到我国的具体条件中去而斗争，換句話說，我們說这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并且我們在这个基础上創造性地确定我們的党的政策、策略、斗争形式和組織形式。这是党同群众和全国人民日益团結的基本保证。

* * *

对印度尼西亚來說，在实行以世界上的两种基本力量，即新兴

力量和**老朽力量**对抗的概念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方面，人民和政府之間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共同基础。這個問題确实是目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基本問題，就是由于这个緣故，所以必須對這個問題有深刻了解并且加以創造性地发展。

今天新兴力量的发展，就是組成它的那些力量的发展，即**社会主义陣营、反帝和反殖民主义新独立国家以及全世界其他进步力量**的发展。这些新力量的发展正在逼使老朽力量即**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以及全世界的一切反动势力**后退。

这三种新力量中的任何一种力量的每一个增长，都是整个新力量的增长，因此，必須加以支持和援助。北加里曼丹人民为爭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反馬来西亚和反英起义，也是一种新兴力量的发展，因此，我們必須尽我們的全部力量支持和帮助它。借用加諾兄的話來說，我們必須作为原則問題来予以帮助。我們也要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程中取得的胜利，对待曼諾里斯·格列索斯的获釋，对待爭取釋放墨西哥、葡萄牙和西班牙被監禁的爱国者的斗争，对待也門的反封建起义，对待委內瑞拉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对待在剛果粉碎冲伯集团和釋放安托万·基贊加的斗争，对待越南南方和南朝鮮正在取得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对待古巴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和擴張的激烈斗争，对待美国、意大利、法国、日本、馬来亚等国工人的罢工斗争。

在这些艰巨的任务面前，印度尼西亚人民絕不能忘記，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无所举动的。非常需要以高度的警惕去識破和击败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的阴谋，他們时时刻刻都想分裂和挑撥新兴力量的队伍之間的关系。

为此，苏加諾總統关于在今年举行第二次亚非會議的主張是

非常正确的，我們完全支持这一主張。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亚非的团结一致，以便击败帝国主义的阴谋。帝国主义者企图通过南斯拉夫和印度的“不結盟”政策来破坏亚非的团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們可以相信，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主張肯定会遇到来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严重阻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想分裂参加討論印中边界問題的科倫坡会议的六国的企图，曾遭到失敗。

印中边界問題是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最现实的例子。尼赫魯为了乞求他为克服国内的經濟破产所如此迫切需要的美元而对人民中国实行了擴張主义的政策——这是符合美国侵略計劃的事情，所以美国給予它在实际上是无限制的援助。实际上，尼赫魯已經自己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合在一起，从而背离了他亲自参加草拟的万隆十項原則，也叛离了新兴力量。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印度国内一些进步分子已經受了尼赫魯的恶毒的沙文主义煽动的欺騙，結果他們支持他，从而帮助了尼赫魯推行他的擴張主义政策。如果印度进步分子的队伍沒有分裂，如果他們反对尼赫魯的話，尼赫魯和他的伙伴是不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侵略的。假如尼赫魯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印度的进步运动就会得到“丰硕的收获”，因为人民不願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

最近的政治經驗表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任务是：加强新兴力量，在国内和国际上建立反帝和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坚强团结，以便反对和击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击败它們的每一个战争計劃和殖民主义侵略。

必須提高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和思想意識，必須加强无产阶级組織，以便能够更熟练地和更有能力地动员和团结人民群众

向政府和在国际范围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并且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

党必须更熟练地动员人民，以便形成对各种国际问题的正确的舆论，这些问题必须由政府和人民团体在国际讲坛——诸如在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经济会议、亚非法律学家会议、在坦噶尼喀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等等——去争取实现。

党必须作出积极的贡献，使行将召开的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获得成功。在各友好协会中的工作也必须加强。

党必须使人民成为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制订者。人民的舆论是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能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起进步作用的唯一牢固的基础。

我们欢迎和准备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帮助政府贯彻对马来亚总理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采取的对抗政策，拉赫曼寡廉鲜耻地企图通过马来西亚计划来实施帝国主义的包围印度尼西亚的政策。只要马来西亚计划不全盘放棄，印度尼西亚就有权利尽它的一切力量保卫自己，这不仅符合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完全符合马来亚、新加坡、沙撈越、文莱和薩巴人民的利益，因为马来西亚只不过是新的、更具有欺騙性的枷鎖来代替旧的奴役枷鎖而已。

为了确保印度尼西亚能够更好地执行历史发展交付给它的任务，决不能出现苏加諾总统制订一套外交政策方针而政府机构贯彻另一套方针的情况。出现下面的情况怎能不令人感到迷惑不解呢：一方面，苏加諾总统明确地把社会主义阵营和一切反帝力量列入新兴力量的行列，而把一切帝国主义和它的一切僕从以及一切黑暗的反独立势力列入老朽力量，但是另一方面，政府机构中却有个人大力地引进西德和日本新殖民主义势力，招来美国的所谓

“和平队”，搬来美国式的“經濟稳定計劃”，还有个别人同反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南朝鮮当权集团眉来眼去，甚至想要同它建立亲密的关系，还有人对在哈瓦那、平壤和柏林設立同級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机构表示动摇，等等，等等。这样的两重路綫是必須加以消除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就需要在外交机构中进行整頓。

进步的外交政策必須由进步人士掌握，而不是由“**腦子和心里充滿污秽、生滿锈、不能适应政治宣言的人**”去掌握——借用苏加諾总统在他的《我們革命的进程》讲话中所說的話。我們所說的进步人士是具有勇气，再重复一次，是具有勇气的进步人士，是敢于反对帝国主义者的罪恶阴谋，并且敢于采取看来可能是更加困难，包含更多的風險，但是对人民、祖国和世界上正在出現的新兴力量的发展更为有益的新道路。

三、改进领导方法，并有計劃地 开展工作，繼續前进

同志們：

我們把一九五一年称之为我們党的“新生”年，这是因为在那一年，即在四月間，举行了拟訂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章的中央全会。但是这个党章却在一九五四年三月間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才通过。与通过党章的同时，这次代表大会还解决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所有基本的和重要的問題，并且規定了兩項紧迫任务，那就是：第一，建立民族統一战綫；第二，繼續进行党的建設。

从一九五一年四月开始的十二年来，或者从一九五四年三月开始的将近九年来，我們为建立民族統一战綫和进行党的建設而

朝夕战斗着。经过这大约十年期间努力工作的结果，我們已經看到了它的成果，那就是：第一，目前已經建立了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經从一个在这項艰巨工作开始初期只有不足一万名党员的党发展成为当前已拥有两百多万名党员的党，过去，它的党员只散布在爪哇，少数在苏門答腊，現在它已經成了遍布全国各地，并且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都已經得到巩固的党。我們之所以說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都已經得到巩固，是因为情况的确如此。不管是对国内政策还是对对外政策所持的态度，或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持的态度，我們党内都是意見一致的。此外，还有一百五十多万名的共产主义青年加入人民青年团，他們是我們党的忠实助手，他們也在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这意味着，合計在一起，目前印度尼西亚已經拥有三百五十多万名共产党员和年輕的共产主义者。所有这些，不論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方面还是在党的建設方面，都是巨大的成績。

談成績完全不是为了驕傲和得意忘形。首先，驕傲和得意忘形不是共产党人的性格。其次，沒有理由可以驕傲和得意忘形，因為我們目前的民族陣綫還沒有足够巩固的基础，我們还須不断地改进和推进农民方面的工作以进一步加强工农联盟；目前二百多万的党员人数还不够多，还不足以領導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这个国家的国土的长度相当于从英国到高加索，其人民散布在三千个島屿上。虽然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基本上都获得了巩固，但所有这些都不是絕對的。我們还必须做許多工作来进一步巩固它，使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证党内思想、意志和行动的統一。

我們不可能驕傲或得意忘形，因為我們认为，我們为无产階級

所做的和貢獻給它的，必須盡可能是最好的和完美無缺的，因此，我們雖然盡力把工作做好，但對無產階級來說也還不可能說是够好的了。何況，我們要是還不能把無產階級和所有的勞動人民從壓迫和剝削中解放出來的話，那我們所做的這一切又算得了什麼呢！

不過，我們必須估計上述這些成績，使我們的每一個黨員都真正認識到，只要我們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針指導下頑強地工作，那我們的工作是一定會有成績的。因此，我們雖然又年長了十歲左右，增加了許多滿頭白髮、視力開始衰退而不得不戴上眼鏡的同志，可是我們並不懊悔，因為這十年左右以來我們已經很好地利用了這段歲月，我們已經使自己成為對無產階級和革命有用的人，即使我們全都對我們已經做了的一切還不感到滿足。現在的問題是，應該怎樣最好地利用我們還活着的歲月，比過去更好地使用它。

我們要是說，一九五一年是我們黨的“新生”年，那並不意味着我們對已經逝世的或仍活着的同志們以及我們自己在一九五一年以前進行的活動加以輕視。我們，舉例說，對參加一九二六年起義、反抗日本軍國主義、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等等的同志們的功績是給予很高的評價的。要是沒有這些同志，就不會有革命運動，而且也不會有像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我們說“新生”，那是因為在那個時候我們的黨在遭到哈達之流的集團白色恐怖的打擊以後又再挺起身來前進，為決心和準備建設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而挺身前進。

我這次關於黨的工作的講話中將不觸及黨的建設的全部問題，也不觸及群眾工作中的全部問題，因為在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文件中已經有了關於這兩大問題的明確的方針，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也發出了關於這兩大問題的一些執行方針。

关于党的建設方面，我只想談談改进領導方法問題和关于文化、思想与組織的四年計劃的主要問題。而有关改进在民族企业家方面、农民方面的工作的問題和四年計劃的詳細指标的問題，将由魯克曼、伊斯迈尔·巴克里和佐哥·苏卓諾等同志分別闡明。

在党的建設中，我們极端重視发展黨員和党組織的問題，但是我們认为，对所有入了党的黨員进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尤为重要。我們把这种看法归納成这么一句話：“**組織上的建設很重要，但思想上的建設尤其重要。**”我們應該坚持这种看法，繼續进行党的建設。

在党的建設中，我們非常重視有計劃地工作。在我們重新建党的最初几年，我們开展工作的計劃不是多方面的，而且只是短期的，像三月計劃、半年計劃或一年計劃等，但后来的工作計劃就比較长期并且包含比較多的方面。到目前为止，我們已經很好地完成了第一个三年計劃，并且再过不久又将完成第二个三年計劃。今年四月第二个三年計劃就要結束，今年年中将举行全国代表會議来檢查第二个三年計劃的执行情况，并制訂新的計劃。目前正在进行着“結束阶段运动”以完成或超額完成以**四增**为中心的第二个三年計劃的指标，这**四增**是：（一）增設政治学校和人民讲习所；（二）增加黨員人数和群众团体成員；（三）增加預备黨員的轉正人数；（四）增加党費收入。

不論是为了使“結束阶段运动”取得成功还是为了使未来新的計劃取得成功，都需要对領導的方法、方式問題給以最大的注意。有許多同志认为，“結束阶段运动”的成功将会为新計劃的执行开辟寬闊的道路，而它的成功却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我們的領導方法。这种看法是非常正确的。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报告中提到：和执行党的其他任务

一样，在执行计划时“具有决定性的并因而必须严格遵守的是，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制订的领导方法，即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以及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并且“领导方法始终应当同正确的工作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并进行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联系起来”。

我们的党把领导方法看得如此重要，以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决定，要求把领导方法真正地贯彻下去，并且除了将之作为各级党委的讨论材料之外，还在所有的各级党校讲授。但这种领导方法仍未被普遍贯彻；因此凡是对它贯彻得好的地方，党的计划和所有的工作也就进行得好，反之，凡是对它不加贯彻或是贯彻得不好的地方，那么党的计划和所有的工作也就进行得不好。

虽然还存在着没有贯彻领导方法的地区，但已经有些地区举行了会议，专门总结领导方法的执行经验和开展了改进领导方法的运动。

在执行每一项任务时我们有两套必须采取的方法，这就是：（一）一般和具体相结合；或者像我们经常说的：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二）领导和普通党员相结合，或者像我们经常说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我们要是不向全体有关人员发出一般号召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为某项具体任务而把党员群众动员起来。但是，要是领导者不直接在若干组织中参加这项任务直到具体细节上的执行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绩，不随时应用他们刚获得的新经验来进行领导的话，那他们也就不可能检查这个一般号召的正确性或加以发展，甚且这个号召还可能变成毫无用处的东西。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我们必须贯彻以四增为中心的第二个三年计划。以四增为中心是正确的，但这四个方面在执行过程中却产生了许多具体问题。在增设政治学校和人民讲习所方面

会产生許多具体問題，在增加党员人数和群众团体的成員方面、增加預备党员的轉正人数方面以及增加党費收入方面，也同样会产生許多具体問題。

对决心做出成績并真正想参加执行这以四增为中心的第二个三年計劃的领导來說，他們采取的方法只能是“深入下层”，到两个或三个党組織——支部或区委会中去，参加它們的討論会，进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使自己同下层組織在以四增为中心的执行方法上存在的具體問題保持接触；并进一步选择若干典型的党员，对他們的政治思想、观点、学习态度和他們取得的成績进行深入的研究，然后直接給这些有关单位——支部或区委会的领导作出指导，帮助他們解决各自单位里发生的一些具体問題。这也是既給予领导又学习领导的方法。

要是自己不通过某些单位中的某些事务和某些人以取得具体的或实际的經驗，那么任何一个领导都无法向他的下层单位作一般号召。通过某些組織中的某些事务和某些个人以取得具体經驗以便于进行指导或一般号召的方法，應該在我們党内成为風气。我們不久以前作出的关于党中央委員和它屬下各党委会的所有委員要對他們住所或住所附近支部或区委会生活負責的規定，其重要意义也就在此。这么一來，我們党的领导人就不会脫离生活，脫离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的活动。不过，我必須在此一提的是，关于这么一个极为重大的任务仍有不少党委委員还没有去执行。

由于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結合的方法沒有得到坚决和普遍的貫徹执行，就使得我們不能迅速地改进我們的领导质量。因此，这种领导方法必須加以推行并且对它的貫徹情况进行更好的监督，使所有各級领导都同样貫徹它。只有采取这个途徑我們才能够清除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并代之以符合客观实际的、

科学的、馬克思主义的領導方法。

領導方法的第二個問題是領導同普通黨員、同群眾相結合的問題。這段期間的經驗表明，要使黨的全部工作取得成就，包括計劃的執行在內，就得建立由團結在有關單位的領導（小組長、書記等）周圍的一批積極分子所組成的領導小組或委員會，而這些積極分子（常務委員、黨委會全體委員會委員、各部委員、黨團和黨組成員等）應該保持着領導者同參加黨的工作、包括參加計劃執行工作在內的被領導者之間的密切聯繫。這個領導小組的活動要是同被領導者緊密地打成一片的話，那它就會變成沒有意義了。因此領導就必須同被領導的普通黨員或群眾之間相結合。相反的，要是沒有一個領導小組來加以組織，普通黨員的活動，群眾的活動將不可能持久，並且不可能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也不可能把這些活動提到更高的階段。

在黨員中間正像人民中間一樣，可以將之分為積極的、中間的和消極的這三類人。領導必須對這種情況了如指掌，並且善於把少數積極的人吸收到領導小組里來（讓他們當黨委委員、各部委員、“工作組”組員、黨團和黨組成員等），並且依靠他們去推動那些仍居中游的黨員們的活動，以及爭取消極分子的支持保證。領導小組和黨員之間的真正團結與鞏固的聯繫並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而是從群眾鬥爭中間產生出來的。不在群眾鬥爭中進行鍛煉就不可能產生領導和群眾之間的真正團結與密切聯繫。

領導小組的陣容有的時候由於鬥爭的激烈而必須加以調整，因為在原領導小組的成員中間可能會有些跟不上形勢發展並且還成了形勢發展的障礙。为了不使黨和群眾受到損失，這種調整應該進行得及時，既不匆促草率，也不拖拉因循。在群眾鬥爭中包括在計劃執行過程中涌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必須加以提拔以代替那

些在領導小組中趕不上形勢發展或道德墮落的人。根據經驗，某些地方和黨組織在執行計劃和執行其他任務中所以失敗的基本原因是：沒有一個始終健全的、同普通黨員和被領導群眾保持鞏固團結和密切聯繫的領導小組。

我們的黨相當長時期以來就認為，正確的領導是“從群眾中”集中起來，然後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的領導，是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原則的領導。但是許多黨幹部對這一點還不是理解得很清楚，以致還存在着許多主觀主義的、不為群眾所理解的領導工作。“從群眾中來”的意思是，我們共產黨人必須聽取群眾中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我們的任務就是，把這些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系統的意見，簡單地說，從這些意見中作出科學的結論。然後把這個結論向群眾說明並傳播到群眾中間去，使群眾通過這些結論領會我們提出的意見並使它成為他們自己的意見，不把它當作是一個完全外來的東西，使群眾堅決支持這些意見並把它貫徹到行動中去。這樣，就考驗了我們提出的意見是否正確。根據這個實踐經驗，我們再一次總結群眾的意見，又把这些結論向群眾說明並傳播到群眾中間去，以致真正取得群眾的支持。這樣無限循環下去，使我們的意見越來越接近真理，在循環的過程中一次比一次更重要和更有意義。

所以說，領導的基本方法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貫徹這個基本方法時，領導必須貫徹一般號召和具體指導相結合的方法，它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個基本方法的組成部分。我們把這個方法掌握得越好，就越能夠更好地進行領導，就越能把領導和群眾結合起來。

從上面的分析就可以知道，某些幹部在貫徹計劃時只非常重視技術性的問題而忽略了領導方法，那是完全錯誤的。計劃的實

彻問題以及党的任何任务的貫徹問題，都首先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領導方法的問題。因此，在貫徹第二个三年計劃“結束階段運動”的同時和日後貫徹新計劃的開始階段，都需要開展一次改進領導方法的運動。

在改進領導方法運動中，必須重視把黨的綱領和黨的每一項政策首先同全體黨員，其次同人民群眾完全結合在一起的問題。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做到了這一步，全體黨員和人民群眾才能動員起來進行鬥爭，因為他們知道他們鬥爭的前景，並且也懂得他們進行鬥爭的當前的和實際的目標。貫徹計劃是我們為了達到這個鬥爭目標而進行的事業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項計劃的目標，是為黨的綱領和黨的政策服務的，我們必須把這個目標向全體黨員非常詳細地說清楚，而且必須把每一個黨員在貫徹計劃中所擔負的任務交代得清楚。當每一個黨員對計劃的目標、對自己在貫徹計劃中所擔負的任務都搞清楚之後，就要開展“深入下層運動”來貫徹上述兩種方法，即（一）一般號召和具體指導相結合；和（二）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方法。在改進領導方法時，必須舉行會議或業務會議，總結“深入下層”的成績。然後又把这些總結的結果貫徹到下層或交“到群眾中去”，考驗它是否正確。隨後又再“深入下層”，再舉行會議或業務會議進行總結，并把这些總結又再貫徹到下層去；在計劃執行期間就是這樣無限循環下去的。但是必須始終記住，在計劃的執行過程中可能會出現計劃以外的同樣需要“深入下層”去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計劃外的問題就應該和計劃工作結合起來，它不該成為貫徹計劃的障礙，而應該成為貫徹計劃的推動力。

改進領導方法是我們的新計劃能否成功的關鍵。我們即將在今年年中開始執行的新計劃是什麼呢？這就是關於文化、思想和

組織問題的四年計劃。

这个文化、思想和組織計劃的中心內容是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組織的問題，它同第二个三年計劃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个新計劃的教育部分包括两个內容，即关于提高干部文化水平（一般知識和专业知識）方面的教育和关于提高干部思想水平的教育。这也意味着我們的党更加积极地参加了文化革命。

在四年計劃中突出文化教育并不意味着我們在計劃中把思想教育挤到后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不仅是因为要增設更多的党校并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而且这个計劃中的文化方面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教育也是分不开的。

当前的斗争阶段要求我們的党現在就得对共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使他們成为具有一般知識和专业知識（具有一定专长）的人，把干部培养为“既是共产党员又是专家”。

在貫徹这个四年計劃的文化部分时，我們的党必須組織大規模运动来提高包括共产党人在內的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从扫除文盲运动、普及小学教育开始，一直到中学的普通教育、艺术专业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各种高等院校系的教育。

在文化計劃中規定全体中央和省級的干部都必須在任何一所三年制的高等学院毕业，县級干部必須在相当于高中程度的人民大学毕业，区干部必須在相当于初中程度的人民教育館毕业，而村級干部則必須在相当于小学程度的人民教育所毕业。必須扫除共产党人中間的文盲現象。按照計劃，將視各个地方上的能力設立教育机构，建立图书网，而在有关党委会的組織下协助解决书面教材問題。

這項文化計劃的草案已經发給部分中央和省委的干部，普遍地受到他們极热烈的欢迎。这并不令人奇怪，因為我們党內的学

习热情本来就是很高的。

有个别的同志問，我們是不是有能力来实现这个宏偉的計劃，師資从什么地方来，經費又从什么地方来。不錯，这个計劃确是宏偉的，它需要大量師資，需要經費。我們当然必須准备大量師資，不过大家要知道，当前有許多共产党员知識分子和非党的进步知識分子，他們願意以他們的知識为劳动人民服务，但是他們却不知道把这些知識用在什么地方，这样的地方过去的确是非常有限的。我們当然必須筹集經費充作我們建立起来的这些学校的开支，不过大家得知道，我們有許多同志在自己掏腰包买书、繳納讲习班或学校的學費，为的是想从資產階級的这些书本或教育机构中获得知識。此外，我們还可以发动某一种符合劳动人民利益并因而受到劳动人民支持的募捐运动，我們过去就經常这样作。何况，这项文化計劃中提出的項目我們这許久来实际上就經在做了，只是它还缺乏系統，还没有加以很好的領導和有效地去进行罢了。

关于四年計劃中的思想教育方面，我們必須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三年計劃期間所进行过的工作的基础上繼續进行下去，不过時間比过去还要加速，而且要特別重視各級党校師資的培养和哲学課。对共产党员作家和艺术家的思想教育也得特別重視，使他們在对待各种具体的事物时都具有坚定的无产階級立場和正确的階級观点，使共产党员艺术家和作家同劳动人民完全打成一片。馬克思主义不应限于在党内学习，而且也应让党外进步人士在党的帮助下学习。使馬克思主义不仅为共产党人或无产階級所有，而且还将为全民所有。

关于四年計劃中的組織部分，我們必須成倍地增加党员人数和群众团体人数。扩大党员的重点應該是：一方面不忽視吸收工人、漁民、青年、大学生、国家公務員、城市貧民等入党的活动，另一

方面要尽可能多地吸收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入党。改进党员组成成分的工作也应从各族和外裔公民的角度来考虑进行。

党在农民方面的工作必须进一步改进，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必须进一步改进，对农民干部的使用、提拔和教育必须予以特别注意。必须使区党委会成为真正能够成功地贯彻计划的关键。应该把各级党组织的定期讨论会更加活跃起来，对理论、党的政策和各种指示以及群众工作进行讨论。要把群众团体中的党组搞得更好，而且，应把领导方法也贯彻到革命的群众组织中去。

这就是有关领导方法和有关文化、思想、组织计划中若干重要部分的扼要阐述。

我想再一次提出，我们必须“在结束阶段运动”中取得成就，完成或超额完成第二个三年计划的指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当在全党鼓起昂扬奋发的精神。“结束阶段运动”的成功将为四年计划的成功开辟广阔的道路。不管是为了“结束阶段运动”的成功还是为了四年计划的成功，我们都得坚决贯彻正确的领导方法。而且，在执行“结束阶段运动”和在执行四年计划中，都应该以无比勇敢的精神进行工作，敢于遵循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五更”路线去对付我们面前的障碍并勇敢地冲破这些障碍。

亲爱的同志们！

现在我就要结束这个报告了。

我们已经探讨了并规定了我们的国内任务、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任务在内的国外任务和继续进行党的建设的任务。我们强调在贯彻这些任务时具有勇敢精神的重要性。

目前，有关进步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方案实在提得不少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民族阵线组织和人民团体这些贯彻上述进步方案的组织工具我们也有了。现在需要的是所有自认为是革

命者和願意改變現狀使它有利於人民的人的勇敢，勇敢，再勇敢。

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為了創建新的印度尼西亞，我們呼喚我們的朋友——非黨的革命人士更加勇敢地用這樣的方式來克服經濟困難，即：要以大多數人即勞動人民的利益為重，而犧牲少數人即地主、官僚資本家和買辦的利益；要消滅城鄉大剝削階級的統治勢力；要建立一個符合當前人民日益強烈要求的、以“納沙貢”為核心的互助合作的新政權。

讓我們更勇敢地對最主要、最危險、最富於侵略性並且對印度尼西亞人民最蠻橫無理的敵人——美帝國主義者為首的帝國主義者，進行鬥爭吧！

讓我們為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保證國際反帝與愛好和平的統一戰綫力量的強大而奮鬥吧！

讓我們以更勇敢的精神把出現在繼續進行黨的建設途中的障礙清除掉吧！我們要把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建設為一個更廣泛、更鞏固和擁有**有才干、有勇氣和有文化**的幹部的黨！

讓我們以三好——**工作好、學習好和道德好**的精神來進行這些工作吧！

讓我們以敢於冒風險的精神繼續前進吧！

勇敢，勇敢，再勇敢！